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〇二）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六八期 ——
（二〇〇七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4d）

【当事者说】我所见证的1968年北大武斗	鸣不平
【劫后反思】狼奶与“蒯大富们”	徐时利
【参考消息】姚文元新撰《回顾与反思》	佚名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当事者说】

我所见证的1968年北大武斗

• 鸣不平 •

最近，在华夏文摘的文革博物馆和其他媒体上看到一些关于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1968年时发生的一些武斗事件的描述。这些描述有不少是正确的，但是有部分由于作者是圈外的人，并非北大师生，以在此期间经常到北大而写出来的一些见闻，难免比较片面（如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109期理胜的文章：忆北大文革旧事）。毛毛在她的《我的父亲的邓小平》一书中也写到她姐姐邓楠和哥哥邓朴方作为当时在北大的学生所见到的武斗，他们当然有亲身经历，邓朴方还深受其害：武斗后期被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非法监禁审讯，不堪折磨而从被监禁的物理大楼四楼出逃摔成重伤，终身致残，邓楠则亲眼见到北大的武斗缘起，目睹武斗的残酷，但是毛毛本人当时未生活在北大，仅仅听到哥哥姐姐说起北大的武斗，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季羨林在《牛棚杂忆》中也有部分对北大武斗的回忆，那是作为被关起来挨批斗的“牛鬼蛇神”角度的观察。

再有就是聂元梓恬不知耻地在所谓口述回忆录中涉及的北大武斗，她居然把自己装扮成正义的化身，是北大武斗的制止者、受害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北大68年的武斗是北京市高校武斗的起始点，对于北京高校的文革有重大影响，所以把

北大的武斗起因，经过等事实正确地记录下来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这段历史的人是一种责任，也对文革历史研究、对后代的教育非常必要。而迄今很少见到当时在北大经历武斗学生的回忆，本文试图把自己当年所见所闻的一部分写出来。作为井冈山的普通成员，我只了解极小一部分事实，本文意图是抛砖引玉，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反思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我是北京大学62级的学生，预定是68年毕业（六年制）。从66年6月第一张大字报发表到后来的北大反工作组，校文革成立，群众组织分为两派，到68年3月爆发武斗，7月底工宣队进校，一直到68年底分配离校，几乎完整地亲历了北大文革的前期。在武斗发生的前后，我正在井冈山广播台做机务工作。我把我所了解的北大武斗的情况写出来，一则是对事实的补充（很多比我更知情的人，比如武斗的具体策、划者和指挥者高云鹏之流，比如北大当时校文革的负责人聂元梓，但是他们忌讳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任何场合下都不敢涉及其真相）；二则是对某些被歪曲的事实的澄清；三则是把这段荒唐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作为对今后的历史教训。

1、北大两派群众组织的形成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出来后，除了一些干部、教师因为参加过国际饭店四清（见文革博物馆通讯395期：杨勋：《我经历的北大文革》）对聂元梓的历史有所了解外，学生大部分是听毛主席和中央的，支持聂元梓。1966年底仅有极少数的学生组织（如老《井冈山》、《红联军》，《红旗飘》等）反对聂元梓和其御用组织《新北大公社》，但是随着聂元梓的独断专横、无知跋扈越来越暴露之后，越来越多的学生组织打起了反聂大旗。如1967年初由一批原来聂元梓的拥护者觉悟后成立的《北京公社》、由新北大公社分裂出来的《新北大公社造反兵团》。1967年中，这五派群众组织经过协商联合起来，组成《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亦即井、红、飘、零、团五派大联合。五派中反对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观点激进程度顺次而降。这里的团派是指《新北大公社造反兵团》，零派是指《北京公社》，因《北京公社》的发起者是系级号0363即化学系1963级的一些同学，在《北京公社》的大旗上大大地写了一个“0”字，所以被称为零派，又往往被对方叫做“臭鸡蛋”派，零派是五派中人数最多的。五派大联合后，总人数达到五六千人，并请出了原副校长、著名科学家周培源教授任总勤务员，以和聂元梓抗衡；实际的负责人是零派的图书馆系研究生侯汉清，他的观点不太激进，而且为人忠厚，可被五派共同接受。反对聂元梓的力量这样统一后对聂元梓的一统天下形成很大的威胁。在井冈山成立后许多《新北大公社》的骨干成员也看清了聂的面目纷纷“起义”参加了井冈山，如原来的公社派的喉舌《新北大广播台》一次就有8名成员（四名最好的播音员、两名编辑、两名机务）造反组成《号角》战斗队集体加入井冈山广播台。顺便说一句，北大的国学大师，前副校长季羨林先生也是持有井冈山派观点的，在他的《牛棚杂忆》中有清楚的表白。

2、两派的对立和对峙

在1968年3月29日前，这种两派对峙的局面持续了近一年，双方的辩论、文斗在升温，在大字报、广播中互相攻击加剧，两派各自都认为自己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但是两派仍在一个食堂吃饭，在原来宿舍睡觉，相安无事。白天双方互相贴大字报，晚间就由双方的广播台对阵打口仗。经常是新北大公社广播台播出一篇精心炮制的文章之后半个小时内，井冈山广播台编辑立即写出针对性的文章播出还击，批驳聂元梓们，在北大静寂的夜空中突然响起嘹亮的“号角”声音，十分鼓舞士气。

双方广播台的高音喇叭，最初都是架设在路灯的电线杆子上或者路边大树上的，两派喇叭混合架设，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偶尔会有一些小动作，是把对方喇叭的两根音频传输塑

料电线在一些树丛里或者其他隐蔽处用一根大头针插进去短路掉，这样不但使这个喇叭不响，整条线路也成了哑巴，扩音机也因超载而无法正常工作。这种短路非常隐蔽，用普通肉眼巡查线路的方法即使走到面前，都难查出故障所在，只好把整段几百米电线一起换掉拿回去检查。为了防止这种破坏，后来就把高音喇叭安放在各派学生居住的宿舍窗外，由同学兼作线路和喇叭保护人了。

这种相对和平的状态持续到1968年3月，后来局势就变得紧张起来了。最先感到紧张的是喉舌广播台。新北大公社广播台是继承了原北京大学广播台机房和设备，位于大饭厅舞台后台上，从大饭厅北面进出，他们使用原来北大广播台分布全燕园的线路网络。而井冈山广播台是在五派大联合后，67年在工字形状的学生宿舍28楼4楼西北尽头（工字的最西北段）459—462四个房间临时设立的，编辑、播音、机务都在这四个房间里工作。而当时28楼是两派合住的，谁都可以轻易走进机房和播音室。由于井冈山广播台播出的稿件语言十分尖刻，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聂元梓之流的行径，对井冈山的成员鼓舞很大，自然遭到新北大公社的仇恨。所以3月里一再传出公社计划武力攻打井冈山广播台的消息，为了广播台的安全，我们把28楼459—462四个房间外的四楼楼道砌了道墙隔离起来，在把362房间和462房间门口的走廊地板打个洞，架起梯子，这样出入广播台必须由3楼爬梯子。把主要的高音喇叭也架设在28楼楼顶平台上，朝向四周，从机房到楼顶也是同样打一个洞，只有通过这个洞口爬梯子才能接近喇叭。这样易守难攻，加大了自卫力度。但是除了广播台外，其他的宿舍楼依然维持原状。

我因为常常值机，所以在28楼3楼找了一个宿舍暂住，除了棉被外其他物品依然放在我们原来的宿舍31楼215室。

3、1968年3·29凌晨发生的有预谋的血腥事件

1968年的3月28日晚，和往常一样，结束了晚上的播音，我在28楼休息了。睡到半夜过后被嘈杂的声音闹醒：新北大公社的武斗队攻打31楼了！我赶紧跑到31楼，看到楼外尽是我们年级受伤的和衣衫不全的井冈山派同学，由于我不在事发现场，这里权且引用一些住在31楼，在3·29子夜被迫跳楼或被驱赶下楼离开宿舍的同学的真切回忆——一辈子都难以忘却的回忆。正是这个晚上的事件，改变了北大文革的历史，把中国最高学府的“文化革命”变成了武斗，也在北京市高校开了武斗的先河。

◇ 当晚住在213室的铭同学：

213室平时住鹏、利、石和我4人。何时、是什么原因又搬进一张双层床，公社的派党住了进去？我回忆不起来了。但213的气氛住着也不舒服，他很少来住，“3·29”前他早把细软拿走，更是不来了。那段时间彭住在我们213室。我记得在“3·29”前的一段时间，我们怕夜袭，有些防备：睡前用床把门顶上，窗内暖气片处还栓着一条绳子，另外还备有一些石灰包等等。但是，临近“3·29”却松懈下来了。“3·29”当夜，床并未顶门，暖气处的绳子也不知去向。门是听到公社的人长矛捣门时临时推过桌子顶上去的。他们几个动作很快，一个接一个从窗户跳了下去，我是最后一个跳的。临跑之前，我在背心裤衩外，还穿上了棉袄棉裤。213的窗外，正是31斋工字楼的北面阴面角落，离垃圾道不远，比较背静，不被人注意。所以，我们5人得以安全逃脱。但我跳楼时墩了一下，胸里边隐隐作痛了一段时间。

3·29天明之后，上午，我进城去北池子向我舅舅（在市公安局工作）通报情况。看到北大墙外32路汽车沿途，海淀、中关村一带，全是逃难的学生，手提着、肩扛着、自行车驮

着大包、小包的行李。那景象真好似逃避一场战争或瘟疫，惨不忍睹！

◇ 当晚住在 2 1 3 室的鹏同学：

2 1 3 室我，彭，石跳下楼后基本安全无恙。铭和利似乎受点轻伤，好像是胸挫伤。另外，门是用床和书桌顶到对面墙顶住的。门的两层胶合板已被长矛捅穿。彭原住 2 1 6，那晚幸亏住到 2 1 3，若 3. 2 8 夜在 2 1 6 住就惨了。

◇ 当晚住在 2 1 3 室的彭同学：

6 8. 3. 2 9，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悍然发动武斗。突然袭击从 3 1 斋 2 楼开始，把睡梦中的井冈山派学生全部驱逐。我们化学系四年级 1 班和 2 班共计 1 7 名井冈山派的同学被逼跳楼逃生。？

3 1 斋是工字形的，南端为工字的一横，其东半横为化学系四年级 2 班男生宿舍，西半横是 1 班男生宿舍。武斗就是从这工字形的一横两半的宿舍开始的。公社的人从 3 1 楼南门进入，一队直奔东半横我们班的 2 1 2、2 1 3、2 1 4、2 1 6 几个宿舍。重点是 2 1 3 和 2 1 4。2 1 4 住化学系四年级二班（6 2 0 3—2）的 4 个井冈山同学：易、立、才、廉，2 1 3 住（6 2 0 3—2）的 5 个井冈山同学：鹏、铭、利、石和我。

3. 2 8 深夜大家都睡了，我还在装我的七管超外差晶体管收音机，到接近 1 2 点才睡。刚睡着一会，就被楼道的轰轰的和铁器碰击（是长矛碰击）的声音吵醒了。一个个的什么东西哗哗地从气窗扔进来，事后才知道是石灰包。我从气窗往外一望，满楼道都是人！头戴柳条帽、身穿清一色黄色军棉袄，个个手持长矛，杆子粉红色的。接着我们的门被推开，铭他们两个住下铺的赶紧推桌子把门抵住。桌子推去又被推开，推去又被推开，反复几次，门总算顶住了一一武斗队员也不敢冒然进屋。最后我们合力把门顶紧。5 人相继从窗子往北跳下二楼。北侧寂无人，我们得以安全脱险。我随即去到 2 8 楼井冈山广播台，向总部报告事态……。

6 2 0 3—2 班住 2 1 4 的 4 人、住 2 1 3 的 4 个人全部跳楼，住 2 1 8 贤等同学也跳楼逃生。住 2 1 2 的兴、中、住 2 1 6 的大、启和兴都是被长矛把一路棒打赶下楼的。

化学系四年级 1 班（6 2 0 3—1）、2 班（6 2 0 3—2）跳楼的同学共计 1 7 名。6 2 0 3—1 的明手腕摔断，钩跳下之后被人用长矛刺成气胸；6 2 0 3—2，住 2 1 7 的贤腰摔坏，2 1 3 的石跳下去只穿着背心裤衩。我们的衣物、被褥、书籍。所有物品丧失殆尽。

跳楼的时候我穿着一条单裤。上身还“空心”穿了我的灰色无领绒衣。脚上没有穿袜子，套上了我在大串联的时候在云南买的翻毛皮鞋，算是最齐全的了。裤子屁股兜里还有几元钱，是刚交过 4 月份伙食费剩下的。记得后来受伤在地院和林学院治疗的时候，和利在五道口买过油饼吃。

◇ 当晚住在 2 1 2 室的中同学：

说起那天晚上的经历还真是惊心动魄。我来说说我这个没敢跳楼的人的经历吧！对方攻打房门之际，我看了看窗外的情况，只见窗下面靠楼门那边有一两个人拿着长长的棍子样的东西（想来是长矛）站着，心想别跳下去以后再被人用长矛扎几下，那可就玩完了。还没拿定主意，对方就攻打进来了，只好听命令走出房门，向 3 1 斋北门走去，一路上被人用棍子打了不知道多少下，出了北门以为会被押送到对方的据点去，就自动向西方走去，没走几步突然发现没有

人押送，大喜，就自己跑了。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右手食指被打破了，还在滴血。那个伤口后来没有完全治愈，至今该食指的指甲仍然是畸形的。

华夏文摘的文革博物馆第109期刊登了理胜的文章《忆北大文革旧事》开宗明义就写道：

“文革中首都各高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始于北大，北大有组织的武斗始于1968年3月29日凌晨。1968年3月29日凌晨，用扎枪、柳条帽、黄色军棉袄统一装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首领为聂元梓的密友高云鹏），切断31斋男生宿舍的电源，向睡梦中的井冈山兵团一派的学生发起武装突袭，在这幢南北长条的四层楼内，由北向南，逐屋、逐层地驱赶对立派学生。当时，井冈山兵团一派没有武斗队组织、没有武斗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根本无法抵御这种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的有组织的突袭。手无寸铁而分散的井冈山派学生只能匆忙逃命，穿着单衣逃命者比比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的冬天是非常冷的，他们损失了全部衣物、书籍、生活用品和财产，在寒夜中茫然地挨冻，怎能不对这种屠杀和施暴者恨得咬牙切齿？化学系住二楼、三楼的人，实在来不及从楼道跑出去的人，有五六十个人是从窗户跳出去的。天亮的时候，逃出31斋的学生都在寒风中瑟瑟。有趣的是，住31斋的“新北大公社”一派学生，居然没有一位胡里糊涂地出逃，大都在热被窝中安卧（当然，拿着补助、执行这次突袭任务的人不在此列）。清华大学的学生组织领袖一看，北大聂元梓一派发动武斗，大占便宜，并且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领导人谢富治对于发动武斗的聂元梓和拥聂武装，根本不追究责任。清华大学的武斗局面，随之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如果说高云鹏为领导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是前台，则聂元梓就是后台。如果说聂元梓是前台，则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领导人谢富治就是后台。”

理胜先生当年在北京求学，没有在北大生活和上学，他还被北大聂元梓的武斗队抓捕审讯，他对北大文革中武斗的观察，有些是十分深刻的，如认为：“井冈山兵团一派没有武斗队组织、没有武斗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根本无法抵御这种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的有组织的突袭。手无寸铁而分散的井冈山派学生只能匆忙逃命，穿着单衣逃命者比比皆是”。但是由于他未曾亲历的局限，描述的事实有些不周全之处，仅仅据上面引述的亲历者回忆，3.29那天晚上，被迫跳楼逃出被包围的31楼化学系62级学生人数就超过17人，其中五六个人受了伤，有的是赤手空拳穿着内衣跳到楼下就被对方的长茅手札穿胸部，造成严重的气胸。没有逃楼的也是在睡梦中被拿着棍棒的武斗人员轰起床，殴打、驱赶着被迫离开自己的宿舍楼，除了贴身衣服，什么也不让带。据后来了解，为了避免出现同班同学相残，高云鹏这位钦点武斗总指挥“先生”也避了点嫌：攻打31楼的武斗队人员是从09系招募的，怕他们不知情。事前在有井冈山同学居住的房间都做好记号，所以有理胜先生文中的现象：“有趣的是，住31斋的“新北大公社”一派学生，居然没有一位胡里糊涂地出逃，大都在热被窝中安卧。”足见这次血腥事件的是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的预谋，而不是一次突发的冲突。

理胜先生说北大有组织的武斗始于1968年3月29日晨，这一点本人不敢苟同：理胜先生后面讲道那是一次突袭，更接近事实。我认为3月29日晨北大发生的根本不是武斗，而是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对井冈山有预谋武装镇压。因为大凡武斗，必然是双方都作了充分准备，双方持有武器，而1968年3.29的北大根本不是这样。照聂元梓自己招认的情况和其他一些资料，新北大公社和聂元梓的校文革确实在3.29前任命了“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高云鹏，开了好几次武斗准备会议，策划对有井冈山学生的一些楼进行武装突袭，井冈山总部所在的28楼由于戒备较严，不好下手，他们就选取了井冈山派的学生较多，而且毫无戒备的31楼作为突破点，规定了时间：3.29凌晨1时；通过校文革控制的学校后勤制造了大批武器：钢管制作的长茅；统一了服装——一律的黄色军棉袄，柳条帽，为便于识别；在武斗之前，由专人在31楼的定点目标房间门上皆做好记号，所以非井冈山同学所住房间连他们的门都没有被敲到。

我原来住在31楼215室，除了我还有2个新北大公社成员，因为我基本不在31楼住，所以215房间当天晚上没有被查抄。但是我放在抽屉里的20元生活费和一些其他东西还是丢掉了：3.29后不久，我请无线电系的一个逍遥派亲戚到31楼215帮我找一下钱还在不在，如在帮我拿回来好交饭费。结果可想而知：分文不剩。我相信不是同屋的同学拿走的，在把对立派全部赶出31楼后，新北大公社对31楼进行了大清洗，个别心存不良者发“校难财”，大肆掠夺同学留在房间的钱财，据说有的人在3.29后手臂上下带了五六块手表；有人大肆搜查被赶走的同学遗留的文字和日记当作黑材料整人。相反，井冈山的所有人，包括总部的成员对3.29的偷袭毫无预料，手里连根本棍都没有，所以造成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如果井冈山存心武斗，有武斗的物资、精神和组织准备，绝对不会出现3.29发生的这种武装偷袭事件。

对于3.29事件，聂元梓在她臭名昭著的口述自传（聂元梓自己也绝对写不来自传：虽然贵为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但是她的文化水平也就是初三三年级）里满口胡言：

但是，“3.25”大武斗之后，形势恶化了。校内的小规模的冲突不断发生，由校外来人武斗转变成校内武斗，“井冈山”在校内强占宿舍楼，建立武斗据点，把“新北大公社”学生的东西从楼里扔下来。“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当然不能忍受，因此就经常发生磨擦，引起冲突和流血事件。形势非常严峻。

面对这种局面，当时，我们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是组织学生不要自发还击，把因牛辉林指挥强占宿舍楼、乱扔学生的行李衣物引起的小打小斗压制下去，不要由小打扩展成大打，尽量避免发生大规模武斗，一方面又叫王茂湘做“井冈山”方面的工作，对对方的群众进行说服劝告，不要站错了队，不要被挑动打武斗，动员“井冈山”的群众“下山”，退出“井冈山”，瓦解“井冈山”，釜底抽薪。王茂湘的“挖山”工作很有成绩，被称为“王铁嘴”，因为他讲话占理，别人都说不过他。他的做群众工作的才能是很出色的。（可是，后来对王茂湘的处理却是非常荒谬非常错误的，因为他在“文革”中的言行，就压制他，又开除他的党籍，不给他评定教授职称等等。这是我久久不能释怀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作对付校内武斗的准备。新北大公社采取的是有组织地对付“井冈山”武斗的办法。总得有人具体负责呀，不得不让什么人出面处理校内武斗的情况，所以他们找了高云鹏担任了“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处理武斗事件。为什么找高云鹏？因为高云鹏做事稳重，有思想水平。在高云鹏的领导下，他不会主动地去打武斗，不会乱来。不到迫不得已，他不会同意动手流血。假如不是高云鹏这个人当时负责“文攻武卫”，那北大的两派武斗会打到什么程度，是无法预料的，只会比现实更严重。高云鹏不仅不会主动地搞武斗，而且很有主见，从来不听任何人的盲目冲动的意见。我亲眼见到，好多学生围着高云鹏，非常冲动地要求打武斗，高云鹏都不受他们的情绪影响，不许他们动手。

聂元梓说3.25后井冈山开始武斗，完全是颠倒黑白，3.29晚以前根本没有任何武斗，在3.29凌晨1时发生的事情就是最好的证据说明北大武斗始自新北大公社的武装镇压。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找了高云鹏担任了“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主任，换个说法就是武斗总指挥。高云鹏上任伊始马上积极策划武斗，借助校文革掌握了全部北大的后勤资源之便，他可以在几天之内就调动起一支上千的专业武斗大军，给以专业的武器和服装配备，并且经过周密策划，发动了3.29武装镇压。聂元梓面对3.29大批井冈山人被打伤，被驱赶的事实不顾，还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什么她也是反对武斗的，她在制止武斗中被被樊能廷同学用匕首刺伤云云。实际上是0363的樊能廷在3.29早上被武力赶出31楼宿舍，丢失全部个

人财物后出于愤怒用手里的一把电工试电笔捅了聂元梓一下，捅破了点皮，出了点血，聂元梓就四处嚷嚷所有凶手刺杀她，还到谢富治那里告状，要捉拿“凶手”。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聂元梓也不能弱智到分不出匕首和试电笔、凶器和工具差别的地步吧。

4、被迫自卫

3.29武装镇压发生后，新北大公社不仅驱逐了31楼全部井冈山派的同学，还在17、18、19、20、21、22、23、24、25、27、35、38、40、42、44楼等采取同样措施，并迅速控制北大全部五个校门，有武装人员把守，检查进出人员。在这种形势下井冈山兵团只好也拿起武器——铁管和长矛进行自卫，在诺大的北大校园内把相邻的28楼、30楼、32、36楼、37楼五个能够连成片的楼占了下來作为基地，一是给没有回家的井冈山同学有个住处，二是也表示井冈山没有被压垮，还在北大校园存在。所以应该说在3.29白天之后北大的武斗才开始。

这五个楼的形势是这样的：28楼是最靠近北大中心三角地的一个工字形宿舍楼，和3.29事件发生的31楼遥遥相对，形状完全相同，井冈山兵团的总部、广播台等都在这个楼。32楼是南邻28楼的宿舍楼，30楼在28楼西面，再往南去是36楼和37楼。这几个楼中，只有37楼是靠着动物园到颐和园的32路公共汽车行驶的海淀大街的，仅有一道石头矮墙相隔。为了打通和外界联系的通道，井冈山把这面墙拆开一个豁口，作为外出的通道。新北大公社为了阻断我们在各个宿舍楼之间的交通，在他们控制的楼上架设了许多大弹弓，大弹弓用双层床翻过来，在床脚上绑上四根医用乳胶管和皮子，用半头砖作子弹，射程可达二、三百米。只要看见井冈山人离开楼进入视线他们便开射，不少人因此受伤。所以井冈山总部又决定在各个宿舍楼之间的通道用双层床做成走廊，这样才免遭大弹弓的袭击。

由于3.29以后，新北大公社把全部学生食堂都控制起来，不但井冈山的同学不能去用餐，而且限制所有非新北大公社派的人用餐。3.29以后，有些没参加任何派的学生依然去学生饭厅去吃饭，没想到新北大派竟派了武斗队把守饭厅，见了非公社派的人就打，不让吃饭。无线电系62级的殷文杰同学看见情况不好，扭头就跑。被公社的武士们追上用长矛刺穿股动脉，尽管他们哀号求助多时，竟无一人上前，眼睁睁地看着流血过多而死。那些凶手面对大学同窗，竟然操戈相见并下毒手杀人，北大是“始作俑者”。从此以后，井冈山派不可能再去食堂吃饭，他们只好在宿舍楼内架起炉灶，用打烂的桌椅床架烧火，煮些挂面充饥，或者使用电炉简单地开伙做饭，后来才在保护之下从37楼的小通道出去到海淀街上去买些米面蔬菜副食。我当时虽然在广播台，但是广播台并没有人做饭，还是个人回到自己原来的班级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化学系62级被从31楼驱赶出来后，驻扎在37楼，所以我每天要到37楼吃饭。

68年5月的一天中午，我从28楼回37楼午餐，顺便就到37楼2楼西头朝北（38楼方向）一间盥洗间去把安装的高音喇叭去扶正一下（方向稍微有点歪了）。没想到仅几秒钟就被斜对面38楼的大弹弓的神弓手瞄准击中，一块半头砖直飞我的头上，慌忙之中我咬了一下，正是这一口救了我：我当时“吃的”砖头正中口腔上下牙之间，把上下各2个门牙齐根打断，嘴唇全部打烂，血肉模糊。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如果再高几公分，那块半头砖就是致命的了，大弹弓的射程有300—400米远，37楼到38楼不超过100米，飞来的半头砖威力不会比子弹头小。不过这断了的四个牙也影响我一辈子：那几个牙损坏导致其他牙齿一个接一个损坏，早就就戴上了全口假牙。

当然现在无法追究谁是这位神弓手了，连迫害邓朴方跳楼的人现在也无处查找，往樊立勤膝盖钉钉子的人也被赦免。但事总是人干的，不说并不等于没人知道，我倒是无意追查谁人干了那些对不起良心的事，只是希望他们能对自己的后代喻之以理，教育他们的后代、后代的后

代别干这种缺德事了，这才是我们反省文革的目的。

5、相持阶段

在3.29发生之后的四个月中，一直处于相持阶段，其间发生过几次较大的武斗，这里是一些同学回忆当时的一些情况

◇ 饺子宴

被赶出31楼后，0362的同学们移住32楼，无衣无食靠募捐卖废品度日，（周培源的外孙女也送来20元），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包饺子苦中作乐，男女同学一起包了两千个左右的饺子，在楼前用一大铁锅煮的，当时大家都未离校，很是热闹。

没有生活费，各想各的办法，书与我瞄上了一口大铜钟，吃过午饭各提一大锤，向它砸去，当当当几十锤后边上敲下一小块，我班二女生自告奋勇拿到海淀废品收购站，老板一句“这是哪来的”吓得二位扔下就跑回了。

◇ 4.26

会下围棋的都知道，一块棋做活的条件是有俩眼，而井冈山别说眼了，连一口气都没有，经过大家再三要求，总部终于下决心进驻36楼，演出了北大最惨烈一幕。那天廉与铭和我同在一楼，我说你们都是独生子，我家弟兄五个，有事我顶着。我们在西头拒守，那些王八蛋竟从宿舍窗户打进，用大锤把房间一个个打通，十分危急，当时地质系刘伟与我并肩抗敌，他还有闲情用矛挑着鞋向墙那边逗闷子。此时我被一家伙用砖头（从挎包掏出的）击中右颊，淌下鲜血，被几个人架到30楼。从此有了单关逃出的棋局，牛猴（井冈山以牛辉林、侯汉清为头）们才能抗衡数月。

◇ 5.2

那天不是运菜，而是干了一荒唐事，36楼保卫战的胜利，使总部得意忘形，竟下令让驻扎37楼的03纵抢拦在38楼间的木床！结果遭到夹击，很多人负伤，其实我伤不重，重的是华，他刚从外边回来，只穿衬衣，被一矛刺向心窝（太狠了），医生处理时我在边上，看到一只棉签全都从伤口中插入。我惊呆了，万幸的是斜着刺入的。捡了一命。联想华后来被整，他太不幸了，毕业后我们常见面，很乐观，95年后失去联系，听说后到天津，诚准备设法联系。我和彭的护甲是把一大铜号喇叭口一分为二制成的。

◇ 深挖洞高架桥

28，30，32，36，37楼之间人员走动经常受到两边弹弓袭击，使许多人受伤，37楼首先决定挖地道，用脸盆，抽屉运土，自行车轮当吊车，大家三班倒，毫无怨言。最难的是挖过地基三合土时，一点点用凿子凿。37楼通后，其他楼也仿效了。为了保证28楼和30楼的交通，总部决定修一个天桥：拆用36楼部分吊顶木料，完全用木头做成一道天桥，天桥由数力系设计的，从28楼四楼的西南端直通30楼的东端。因为地面完全被新北大公社控制，所以天桥的架设全在空中完成：在走廊里把木头拼接好，一头拉一头推地把重达两吨的天桥架设完毕。这道天桥一时在北大校园成了道风景线。架设时，我参加了，总部赏每人一碗热汤面。一桥飞架东西，鼓舞了大家士气。

◇ 窃听电话

由于北大全校的电讯系统都由新北大公社把持，井冈山几个楼间以及和外界的通讯全部被切断。所以在公社把守的地区仍使用原来的电话通讯系统指挥战斗。为了了解对方武斗的动态，以最大限度保护自己，依照原来在学校电话总机工作的井冈山人提供的信息，总部秘密决定从28楼挖一条地道通往29楼角的电话电缆接头，然后连接窃听电缆每天24小时专人值守登记记录每个通话，如得到新北大公社方面重要武斗动向马上向总部报告。这是一个高度机密的工程，从动工到执行仅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窃听工程还真的起了大作用，好几次由公社挑起的武斗行动都因为事先得知，做好了准备而减少了损失，也有多次井冈山人员外出被发现，他们在调遣武斗人员抓捕的电话被窃听后及时通知该井冈山人员返回避免被抓。公社发现“作战机密”屡屡泄漏，还在内部抓“内奸”，直到武斗结束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所有的指挥武斗行动均被窃听。

◇ 6. 24

由于楼友购粮菜经常被歹徒抢，总部就决定为大家集体运一次肉品和蔬菜，为防意外派些人员保护，这天是1968年6月24日。03纵有10人参加，我年级有耿，顺和我，化二王（与许同为“秋收起义”）等，当卡车开过来正卸菜之际，众多公社兵分别从中关村门及40楼门沿马路冲出，03纵和海燕纵队把东边的公社武斗人员顶回去了，不想防范西面的02纵却溃败了，两面夹击把我们包围在中间，只好夺路而逃，眼看着王被十几个人扎倒，他的柳条帽被一家伙用长矛扎住挑在肩上，就像挑着一颗人头！卡车司机也被扎成重伤（他们还有人性吗）。王头和腿上身中17枪，万幸的是他甲下面加了一护档板，保护肚子免遭十几矛，他受伤后发起高烧，我每天喂他炼乳，管家则给他做些流食（他们人少，平常和我们一起吃饭）。当天大家吃着抢运回的食品做成的土豆炖肉，都流下眼泪。王大难不死有后福，后来回炉北大化学系并考上研究生，成为琪、利年级的党支书。

◇ 7. ?

井冈山通往外面的一口气就是37楼中间豁口，为防弹弓架了木床直通马路边，那一天得到情报半夜公社兵要来破坏，我将信将疑，耿说一定准确（他知道窃听电话之事），半夜2，3点钟，我与耿，魏埋伏于大门外床榻走廊内，突见冲来许多穿军棉衣，手拿消防斧的歹徒，照着床板就砍，我三人挺长矛（绑在撑竿跳的杆上）就一顿乱刺。这时聚光灯打开了，守在楼上同学一起打弹弓，连彝的小细胳膊都拉断了弹弓橡胶带。书就是在门外走廊中被后边长矛刺中的，不是逃跑时扎了屁股。

◇ 还乡团

化四楼里人虽不多，但住北京的同学经常不断有人来探望，我们戏称为还乡团，也有不少女生，记得有庄，云等，一次我们陪刺杀聂元梓的“凶手”到颐和园散心——在一片桃园帮园林工人用纸袋包桃，回来见到云在楼内，她说，以后你们少出去，新北大公社到处抓人，听了很感动。

◇ 集体灶

吃了四个月集体灶，印象最深的有三次：管家告假由风掌权，一天早上她提了两颗猪头回来，弟兄们用长矛烫毛，她给做了一大盆，美餐几顿，纷纷称赞代表手头松。二是郑世均蒸的水晶包，很有水平，我给当小工，大铁锅下烧了一只床。三是7.22架线后，我们把撒在马

路上当绊子的绿豆、红豆、黄豆连马粪一起扫回，分门别类，发绿豆芽，泡黄豆，熬红豆粥，别的年级看到十分羡慕。

◇ 7. 22 接电

7 月中井冈山控制的 5 个楼：28、30、32、36、37 楼被公社指使电工班强行断电，楼内失去照明，广播台也失声，更要命的是这时守楼的井冈山人只有靠电炉做饭，没有电意味着我们只能断炊。所以总部决定从地院借来变压器，从 37 楼外马路路灯杆上的 10 千伏高压线接高压电变成 220 伏通入 37 楼内。这个行动也被公社探知动用武斗队到接电现场准备破坏我们的行动，所以我方作了保护措施，安排人保卫接电的电工。连连征战，看到许多同学受伤，心态十分厌倦，在楼道等着出发前，彭对我说，打完这仗回家吧，我说好吧。他随手抄起两本资本论放入护甲下，“让马克思保佑我吧”就跑到马路上。外校同学理胜写的北大武斗纪实基本准确。只是那辆带拖车的 32 路车是被化三小白毛拦下的，他用一手电蒙上红布，像李玉和一样晃动，司机看到摘下拖车调头而去，这样我们才能在马路上架起两道木床墙，后来这拖车便成了公社的坦克，不幸的是推过来被倒了的木床打住眼，坦克兵都惨了。那天他们还用了燃烧弹，很吓人。我们受伤不多，不过我却挂了最重一次彩：右眉骨中了一矛，血流不少，管家不在，风为我包扎的，多谢。当电灯重明时，大家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6、工宣队进校，历时 120 天的武斗结束

68 年 7 月 27 日，工宣队为制止清华大学武斗开进清华，遭蒯大富的井冈山的武装抵抗，工宣队员多有伤亡，事态严重，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次日工宣队也开进北大，解除了两派的武装，至此，历时 4 个月的北大武斗结束。

荒唐的文革，荒唐的北大武斗，这种荒唐事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是第一次，我相信也会是最后一次。

注：本文引用了一些同学的回忆资料，因为没有列出全名，在此一并致谢。

~~~~~

## 【劫后反思】

### 狼奶与“蒯大富们”

• 徐时利 •

## ◇ 前言

去年 10 月 13 日凌晨，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女士于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五岁。王光美女士的逝世，搅起了人们心中尚未落地的“文革”尘埃……

王光美出身于富有家庭，硕士学历。1946 年末奔赴延安，1948 年与刘少奇结为夫妇。从此，王光美作为共产党第二号大人物刘少奇的配偶，身不由己，跌入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漩涡之中。中共党内举世罕见的极权统治和举世罕见的残酷斗争，造就了王光美的举世罕见的奇特经历：上天入地，暴荣暴辱，大起大落……

如果出一道选择题，问：什么是王光美一生中最深刻的“入地”、最惨烈的“暴辱”和最大落差的“大落”？凡是年龄稍大、对“文革”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大概很多人都会选择“智擒

王光美”。

所谓“智擒王光美”，是发生在“文革”初期1967年1月6日的一次政治绑架事件。王光美和她的丈夫刘少奇同时上当受骗，落入清华大学“造反派”事先精心设计的圈套，使王光美被绑架到清华大学接受“批斗”。

此事在当时轰动全国，当时清华大学的文革小报《井冈山报》第九、十期合刊上，刊载了介绍事件始末的文章，题为《智擒王光美》，销路甚畅。其他文革小报也纷纷转载，一时间“洛阳纸贵”。没有亲历“文革”的青年读者欲了解事件的始末，可在网上检索“智擒王光美”，便可一目了然。

这次绑架事件，在当代绑架史上创下两项重大纪录：

一曰时间早——1967年1月6日，在我国发生成功地绑架了国家主席夫人的轰动事件时，今天在世界上到处制造事端的的那些“绑匪”们还兜着尿布呢！

二曰被绑架者的身分高——其它“绑匪”们只不过绑架一些新闻记者、商人、工程技术人员，甚至是人地两生的旅游者，而我们绑架的却是如此重型人物——堂堂国家主席的夫人——迄今为止，世界各地的绑匪们还都不曾打破这样的纪录……

令人称奇的是，在这场“斗智”中，失算的一方，是共产党的二号党魁、尚未被免职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共产党内，刘少奇是长期从事“白区”工作的“白区工作模范”，足智多谋，人称“小诸葛”。况且，绑架事件发生时，刘少奇年届七旬，亲身经历过党内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斗争，是一块经过大风雨、见过大世面的十分辛辣的“老姜”，却居然被骗，眼睁睁地看着夫人王光美女士在他眼前被人绑架走。

更加令人称奇的是，绑架事件的策划者，是年仅21岁的清华大学在校学生蒯大富以及一批与他同龄的年轻人。蒯大富是江苏省滨海县的农家子弟，1963年18岁时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在清华大学期间，“六年没花掉一千块钱”，足见其家境的清贫，属于没有什么官场背景的平民子弟。（田炳信：《采访今日蒯大富》，见本刊zk0511f——编注）

蒯大富以及与他同龄的“红卫兵战友们”都是“初生牛犊”，没经过“培训”直接“上岗”。但初试锋芒，就身手不凡，策划的周密和手段的老辣与他们稚嫩的年龄绝不相称，颠覆了“新姜不如老姜辣”这一古训。

对“智擒王光美”事件，我们不当只看成是一桩奇闻。在这桩奇闻的背后，有着十分厚重的、令人痛心的政治、社会背景。总而言之，“文革”中出现“蒯大富”，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拟将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人群为考察对象，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在校大学生，也包括即将升入大学的“准大学生”——高中的高年级学生。这批人不仅在年龄上与“老三届”接轨，在学历上也于“老三届”交叉。在“文革”发生时，这批大学生和准大学生已经成年或即将成年，已经达到或即将达到对自己行为承担负责的法定年龄。这批人，才真正是“红卫兵”的中坚力量；“老三届”中的那些低龄红卫兵，由于年幼无知，倒有些跟着瞎起哄的味道。

“文革”时期，这些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

无疑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岂止当时，在今天社会的各行各业，这批人仍旧在领袖群伦。对未来，他们也在积极主动施加影响，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未来世界；最起码，他们的力量作为一种政治惯性，一种习惯势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时至今日，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已经迈向老年或正在向老年迈进，却很少有人对当年的恶行进行理性的反思，很少有人向受害人道歉，对受害人说一声“对不起”对他们说来竟然如此困难！这一现象，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文革”前十七年那些“狼奶”的毒性之剧。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类似于“老三届”这样的简单明了、为社会所公认的专名词来称呼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怎么办？想来想去，想到“蒯大富”是他们之中典型的一员，只不过由于各种机缘出了大名，因而留下了较多的文字材料，供我们分析和研究。于是，在本文中，只好将“蒯大富们”当作是这个年龄段的大学生、准大学生的代名词，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对“文革十年”和“老三届”已经有大量专门研究论述的文章。而对“文革前十七年”强灌“狼奶”和这批“文革”时期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却缺少整体性的考察。其实，这批人才是“文革”前十七年共产党教育的正宗产品呢！他们受教育的历史、成长的历史最能体现共产党建国十七年的意识形态。他们是“文革”十年的历史载体，在他们的血液中，积淀了太多的党文化的有害因素，有必要加以清理，做一次“血液透析”，这对中华民族说来，不仅利在当代，而且功在千秋！

#### ◇ 强灌“狼奶”十七年

千千万万的“蒯大富们”，在十七年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狼奶”是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精神食粮。

回顾历史，中共自1949年在全国掌权，至1966发动“文化大革命”，共计十七年。十七年不算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在中国当代史上，却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间，这是因为新朝肇建，新君登极，庶事草创。毛泽东建立的新朝虽然名为“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专制极权政权，其极权的程度超越了中国历代王朝——毛泽东五十年代的秘书李锐就曾经说过：“毛泽东比什么皇帝都厉害”。（《德国之声采访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毛泽东比什么皇帝都厉害》，2006—10—2）

毛泽东作为“开国之君”，他的指导思想、行为模式，特别是他创建的关于党的“一元化”极权制度——垂范于后，以后历届中共领导人都在遵循。迄今为止，“毛太祖”制造的恶劣政治生态环境并无根本性改变，“十七年”影响既深且远，偌大的一个中国，今天仍然被笼罩在“文革之前十七年”的阴影之中。

但是，“文革前十七年”与“文革”之间的关系却格外密切、格外直接——犹如嫡亲父子——其因果关系是：“十七年”的罪恶之花，结出“文革”的灾难之果。从这种意义说，所谓“文革之前十七年”确实没为中国打下好底子，从根子上就坏了。

回首1949年建国之初，中共挟内战胜利之余威，以气冲斗牛的气概，大刀阔斧，砸烂旧制度，不奏前朝曲。在打碎旧国家机器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气魄宏大，以思想改造为先导，将“思想牢笼”的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使其务必坚固严密，把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通过所谓“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关进思想的牢笼里，谁都不得窥探外界。出生于19

41年—1949年那些人，自从他们脱离婴幼儿的混沌无知状态、睁开眼睛看世界，就已经身在牢内，看到的就是牢内的景色，听到的也是牢内的声音，生来如此，也就不再有“牢笼”的概念。

在思想牢笼内，青少年天天被“强灌”的只是单一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体的“狼奶”，别无精神食粮。对“狼奶”，想不吃是办不到的，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狼奶”——如果哪位父母想给自己的孩子另外增加一点精神营养，那可得偷偷摸摸的，被外界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连大人带孩子，都得挨整。

那么，究竟“什么是狼奶”呢？对于这个问题，长年累月吃“狼奶”的人由于有着切肤之痛，作为受害者，他们给“狼奶”下的定义既准确鲜明而又一语破的：

“所谓‘狼奶’，就是被政党有意歪曲的历史事实和观念。”（冉云飞：《抄民国辞书凡例，哀悼中国青年报之“冰点”》）

这个对“狼奶”的定义实在精辟，值得牢记！现在，就让我们按照这个定义，首先先看一看什么是“被政党有意歪曲的历史事实”。

大体说来，共产党编造的伪历史分两类，一类是蓄意虚构的“光荣史”，另一类是掩盖罪恶的“谎言史”。

在虚假的“光荣史”中，举例说，有“国民党不抗战，是共产党打垮了日本鬼子”这类弥天大谎——为的是用来证明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

对八年抗战，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人群，在“文革”前只知道毛泽东的游击战，只知道“平型关大战”，而对国民党主战场的几次殊死搏斗的重大战役、对修建维护滇缅公路艰苦卓绝的历程、对西方国家的某些正义援助，全都由于共产党当局只字不提而一无所知。共产党的决策人硬是昧着良心抹杀国民党将士的浴血奋战的事实，宁肯使感天地、泣鬼神的民族抗战史在亿万青年头脑中变成一页空白也不愿说出真相。更有甚者，毛泽东在共产党召开的“七大”上公然撒谎，说蒋介石不抗战：“蹲在峨眉山上一担水也没挑，却把手伸得长长的要摘桃子！”

对于这种谎言，如今受骗的一代纷纷在网上发表评论，揭露虚假的“光荣史”：

我小时候读书，我得到的是：蒋匪帮和日寇是一伙！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我军才抗战，是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了日寇，蒋匪是摘桃子，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蒋匪是下山摘桃子！

而在掩盖罪行的“谎言史”中，最大的谎言莫过于将1959年至1961年大饥谨的真正原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掩盖起来，将饿死三千多万百姓的可怕事实掩盖起来，谎称“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曾在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曾经这样评论这次灾害，他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对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全都亲身经历过，完完整整挨过三年饿。如果对他们作一个问卷调查，请他们如实回答：在1959年至1961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你

是否饿过肚子？恐怕回答“是”的，占90%都不止！

饿了三年肚子的大学生、准大学生们，到了“文革”，天天豪迈地高唱《红卫兵战歌》：“敢革命，敢造反，革命造反永不停”——一个奇异的吊诡是，却无人敢造“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这一弥天大谎的反——这首先是因为，党已经说过他们饿了三年肚子是由于“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这些号称“敢革命，敢造反，革命造反永不停”的红卫兵对此根本没有提出质疑的胆量。其次由于，每一个年轻人都只在自己读书学习的小范围内活动，偌大一个中国，他们之中谁有本事去了解其它地区的风风雨雨？所以就只能由党信口开河瞎编去。

然而，党本来想用“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长期欺骗下去，不料全能的上帝给予揭露：1959～1961年间的气象水文资料显示，这三年根本没有任何“自然灾害”。有一篇考据性文章，题为《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以详实的气象水文资料显示所谓“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虚假性：

事实是，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

这类考据文章摆事实，讲道理，非常富有说服力，使共产党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说不攻自破，而这场灾害的制造者不得不走上历史的被告席，接受三千万被饿毙的亡灵的审判！

这类“被政党有意歪曲的历史事实”俯拾即是，不能一一列举。但是，要论谎言的“集大成者”，看来，那可是非中共自己的历史《中共党史》莫属了。党的掌握绝对权力的最高领导人，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利益需要，随时随地的改编他们的历史，用后一个谎言遮盖前一个谎言，前后举凡十数变、数十变，变来变去，使得自己的历史变得“非历史化”——再说什么也没人对“党史”信以为真了。

那么，什么是“被政党有意歪曲的观念”呢？“阶级斗争扩大化”即是其中之一。

十七年来，共产党以夸大其词、或无中生有的方式，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宣讲阶级斗争。最早是将地主、富农妖魔化。那被宣扬得沸沸扬扬的地主刘文彩的“水牢”、“收租院”，事后证明，全属一级又一级党组织亲自部署，投入大量财力、多方网罗人才，经过长时间精心编造出来的骗人鬼话。笔者清楚地记得，当年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关于刘文彩水牢的长篇报道，当看到刚刚生产三天的贫农产妇冷月英被关进臭水齐腰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的时，笔者满腔悲愤，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笑蜀先生写出长篇专著《“刘文彩神话”炮制始末》，揭露造假的全过程，令人震惊。笔者作为当年的受骗者，读了这部揭露真相的著作后，不禁感到一阵阵严寒彻骨，弄不明白各级党组织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力量、编造如此巨大的假话，欺骗一代又一代对党如此不敢怀有二心的青年人？为什么居心叵测，要通过谎言制造仇恨？笔者至今困惑不解：或许，只有通过伪造历史才能愚弄人民吧？否则说不出为什么这么做的理由。

后来，“水牢”的谎言被揭穿，原来刘文彩的庄园从来不曾有过什么“水牢”。有记者找到冷月英核对事实，冷月英拒绝正面回答，但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刘文彩“水牢”幸存者冷月英：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现在，在毛泽东宣扬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破产，回过头来看一看当年的地主、富农，无非是有多有几亩、十几亩、几十亩、百十亩土地的农民，大部分安分守己、老实巴交——起码没有现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样多、那样大的权力，做的坏事也比大队书记少得多。

到了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共产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

天天讲”，使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入了像“鬼打墙”一般的阶级斗争的怪圈。在怪圈里，大家都得在瞪大眼睛寻找“阶级敌人”。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由于对共产党建国之前的历史没有记忆，所以无从进行比较鉴别，共产党说什么，他们信什么，成为“阶级斗争”理论的最大受害人——他们的胸中充满阶级仇恨，血管中流淌着阶级复仇的热血，由灌输“狼奶”而导致的仇恨意识，使他们成为凶狠的“准打手”，只要党一声令下，让他们打谁就打谁，往死里打。

考察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看一看他们曾经生活过十七年的社会环境是十分必要的。今天在互联网上可以得到大量信息的青年人——尽管有大量网警天天在网上巡逻，情况毕竟好多了——根本无法想象在五、六十年代共产党思想控制的蛮横状况。无所不在的各级党组织监控下的思想监牢，远远超过了米歇尔·福科所描述的圆形的透明监视厅，那真的是密不透风的多重结构，任何人休想接触到一丁点儿共产党控制以外的信息。正如坐过监狱的作家秦耕先生在走出监狱时所说的：

“整个中国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大的监狱，我们现在只不过待在大监狱的小套间中。我今天出了这道大铁门，其实身子还在大的监狱中。我在这里没有自由，出了这个大铁门照样也不会有什么自由。”（秦耕：《狱中纪实终结篇：仰天大笑出狱去》）

在那十七年中，共产党依靠“一党专政”的特殊地位，通过教科书、广播、电影、电视、图画、歌曲、报纸、杂志、大标语、黑板报，以及各式各样的报告会、讨论会、政治学习会等不同渠道，铺天盖地，强灌“狼奶”，灌得人人都是满满一肚子的“毛泽东思想”。在那十七年，哪一个年轻人都逃脱不了被毛泽东思想“狼孩化”的大劫。

有一位“文革”时正读大学的“狼孩”事后这样描述他们那一代成长的环境：“我们是在‘颂歌’与‘战歌’交响回荡的噪音里长大的。”（萧一湘：《天涯何处祭文革》）高分贝的强噪音“一个领袖、一个党”天天都在播放，直到听得那些年轻人两只耳朵内都磨出厚厚的老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点点滴滴，经过十七年，积跬步终致千里——年轻人最终被“狼奶”同化，变成了狼孩！

怎样才算变成了“狼孩”？其标志是什么？常年被强灌“狼奶”的人作了精彩的概括：变成“狼孩”的标志就是——“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胡星斗：《中国必须警惕“坏的社会主义”与“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兼论我的“中国问题学”研究》）

到这一步，共产党大功告成：那些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完成了良知被泯灭、不再知道运用自己的理性的“狼孩化”转变过程，成为人数庞大的“狼孩群体”。

在自然界，“狼孩”是指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被狼叼走并由狼哺育起来的人类幼儿。这种情况当然少见，但在中外文献中却都有报道。这些人类幼童长期生活在狼群中，脱离了人类的生活环境，养成了狼的习性。等到若干年后被人类发现，重返人类社会的时候，“狼孩”们的生活习性和生活技能已经与人类大相径庭，人类会的他们不会，人类不会的他们却极其擅长。比如：

他们不会直立行走，但是用四肢爬行时飞快；

他们的嗅觉极其灵敏，老远就能嗅到猎物，却不辨香臭——无论面对香水，还是粪便，全都无动于衷；

他们不会说话，能够长时间保持沉默，但是能够在某一个时刻，比如月光皎洁的夜晚，突

然发出尖利的狂啸，令人毛骨悚然；

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安安静静，看上去和正常人类一样，可一旦睡醒，立刻神经质地抽搐起来，还像狼一样不停地前后摇摆；

他们还有对人类来说不可思议、只有狼才有的本领：耳朵会前后扇动，眼睛能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蒯大富们”不同于自然界中偶然存在的“狼孩”，他们是人数巨大的群体，是共产党用“狼奶”批量化喂养出的正宗产品。他们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初起时，年龄在25岁至17岁之间；受教育程度较高，是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即中学的高年级学生。这个年龄段的人，心理发育和生理发育已经成熟或即将成熟，其中年纪最小的也马上进入成为刑事责任人的法定年龄。

共产党从1949年开始在全国掌权，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共计十七年。在这期间，“蒯大富们”每个人都完完整整地受了共产党十七年“狼奶”教育，他们身上充分体现共产党教育的特色。探讨他们的集体性格，最能暴露强灌“狼奶”的危害性。

“蒯大富们”在“文革”期间步入成年。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老三届”中的低龄学生相比，有着更多的自觉意义，用“单纯、幼稚”来辩解他们的过错是不适宜的。总体说来，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由于在十七年中备受愚民教育的毒害，使得原本资质聪慧的青年已被毒化成思想僵化、行为偏激、视野狭窄、智力残缺的“狼孩”。中共十七年的“狼奶”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极其黑暗的一页，这种以扫荡同情、理解、怜悯等人类高尚情操为要务，一味培育凶狠、阴暗等变态心理为方针的教育，其危害性百倍于摧残生命、制造“孔己己们”的“八股取士”制度。

由于中共强调“集体主义”，所以，人数庞大的“狼孩群体”具有很多共同特征，构成他们的“集体性格”。举凡这些“集体性格”而导致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基础，无一不是强灌“狼奶”的结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狼孩”们的不幸：在旷日持久的“文革”十年中，成为众多恶行的载体，既害人又受害，在当代青年运动史上，用血、泪和肮脏的东西，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

当然，对于那些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的性格是不可一概而论的，下文即将谈到，在他们中间毕竟出现了像郭世英（1942—1968）、遇罗克（1942—1970）、杨小凯（1948—2004）那样少数能够独立思考、因而被残酷关押、甚至被从肉体消灭的“另类”。但是，作为“狼孩群体”，确实可以从他们身上概括出不少共同点。

前边已经谈到，由于长期被强灌“狼奶”的结果，对于那些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也和自然界的“狼孩”一样，正常人类有的他们没有，正常人类没有的他们极其擅长。先看看他有的、而正常人类没有的是什么：

#### 一、有荒诞的“救世”情结：

和自然界的“狼孩”一样，毛泽东思想的“狼奶”哺育出来的人数众多的“狼孩”思维方式同样十分怪诞：明明自己因营养不良而面黄肌瘦——有些人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还患过营养性浮肿——明明自己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裤和露着脚指头的破鞋，却愚昧地相信，世界上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正眼巴巴地盼望着自己去解放他们。他们和毛泽东一样，



有着纠缠不清的“救世主”情结，相信自己是跟随着“大救星”毛泽东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小救星”。这种思想，紧密地配合了毛泽东的“井冈山道路通天下，毛泽东思想照全球”自大狂式的乌托邦，自欺欺人。如今，众多“过来人”纷纷撰文描述他们受骗的经历：

“那时觉得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处在水深火热中，就感到自己吃着窝头是多么幸福！‘解放全人类’是多么崇高的事业”！（余小偶：《从浅蓝到深蓝》）

“我们被告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一根刷绿漆的老黄瓜”：《忆苦思甜》）

“自己饿得像鬼时还想着要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阶级兄弟”。（之南：《06年：总结我们的天灾人祸》）

著名作家王小波幽默地将这种荒诞心态概括为“救世情结与白日梦”，而且，王小波本人就承认，自己在当中学生的时候虽然蔫蔫的，同样有“救世情结”，同样做“白日梦”。因为，在那个年代，年轻人真的被愚弄得很惨，一个个半傻不呆的。王小波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将“救世情结”和“白日梦”辛辣地讽刺为“手淫中华”与“意淫全世界”，受欺骗的愤怒之情被他表达得如此淋漓酣畅！（王小波：《救世情结与白日梦》）

## 二、有狂热的偶像崇拜：

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为了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必然要从思想上、肉体上制服下边所有的臣民。于是，他一方面将自己神化，使肉麻的颂歌充斥所有媒体：用兵如神，料事如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能移山，能填海，能扭转乾坤，能使江河倒流，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另一方面，党的最高领袖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地位，努力营造恐怖气氛，使用凶残的手段镇压反抗者，让他们俯首贴耳。独裁者说一不二，任何试图向他表达不同意见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那些“崩大富们”，即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其实很清楚在他们身边多次发生在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惨景，直觉使他们感受到恐惧，恐惧又使他们变得十分乖巧。别看他们年纪小小的，他们早早的就意识到，毛泽东这尊“神”可不是好惹的，为了自家的身家性命和日后前程，只能乖乖地溜着他，顺着他。所以，别看“狼孩”们口头上高叫“造反”，骨子里却奴性十足，是一群拜倒在权威脚下的奴才。于是，“狼孩们”所自豪的“造反”成了一种“吊诡”——“奉旨造反”。所谓“奉旨造反”，就是跪着接旨，然后按照圣旨造反，不敢越雷池一步。对这种“造反”，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荒谬！倒是挺有中国特色。

这些“文革”时期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的头脑诚然僵化愚昧，但绝不纯洁——在“文革”前十七年那样龌龊的政治环境里能生长出“纯洁”？别扯淡了——“狼孩”们挺势力的，挺会见风使舵的，小小的年纪，他们早就学会了谄媚权贵，学会了狐假虎威，学会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狼孩”们的偶像崇拜看上去煞有介事，其实十分猥琐，“文革”前夕的所谓“偶像崇拜”，本是“愚昧”和“惧怕”二者交配而产生的一窝怪胎，怪胎自从一落地，就开始以其双重个性兴妖作怪，为患人间。

## 三、有嗜血的斗争激情：

“文革”一开始，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中的高干子女们，得风气之先，他们忽啦啦一下子涌上政治斗争的舞台，一个个变得凶神恶煞一般，抡起皮带打老师，打同学，打一切他们想打的人，强迫他们弯腰、罚跪、坐“喷气式”、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剃阴阳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们到处打砸抢，种种恶行像倾盆大雨般从天而降，恐怖的阴霾笼罩全国。据

“文革”结束后公开披露的统计数字，仅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其中有13名是校长。（王友琴：《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2001年第3期《山西文学》）

长安街上赫然刷出大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红色恐怖好得很!!!

在“流血的红八月”，“嗜血的斗争激情”被宣扬到了极致，没有亲历这场浩劫的人，绝对难以想像当时腥风血雨的残忍程度。

在上文列举的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每一个人的惨死过程都是一个血腥案例。即使未被打死的，同样充满嗜血的残暴。请看L市某中学语文女教师（“文革”开始时，该女教师28岁）对于他们学校学生们残忍行为的叙述：

“你想听听牛棚里的事吗？都说我们学校红卫兵的凶狠是出名的。其实不是凶狠，而是残忍。什么叫做残忍？我在文革时才弄明白：残忍就是想方设法、充满创意地迫害人，决不只是用力气打。比方叫你解开腰带，将几十条毛毛虫放进裤子里，再叫你把腰带扎上，这滋味你受过得吗？比方用塑料眼药瓶吸凉水，往耳朵里灌，直灌满耳朵眼儿。这刑罚你受过得吗？一位姓K的数学老师至今还闹中耳炎，就是那时凉水灌耳朵留下的病根。再比方三九天叫你脱下衣服，只留背心裤衩，站在五楼窗台上冻着。弄不好一头栽下去？你在哪里听过有这样的刑罚？当然，这残忍的行为中，还带着学生们恶作剧的成分。可我们一位老师被红卫兵用盐酸泼在脸上，烧瞎了一只眼，就纯粹是一种凶残了。还有一位男老师叫他们用绳子把阴茎扎紧，再逼他喝水，直胀得睾丸奇大，通体透明，差点胀破，才松开绳子。你说如果不是文革，你能看到人性会有多么凶残？你知道什么叫‘狼奶养大的一代’吧！”（冯骥才：《文革中一百个人的十年：唯一没有贴封条的嘴巴》）

这些学生的恶行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十七年中强灌“狼奶”的必然结果，天天强灌“狼奶”，越灌越多，自然要从“人”转化成“狼”。那些“蒯大富们”，即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特别是那些中共的“干部子弟”们，被灌得满肚子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狼奶”，狼性能不发作吗？

他们开始造反，矛头所向，就是与他们朝夕相处，向他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们。所以，所以，“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又被称为“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共产党长期以来以仇恨为基调的教育早就使这些年轻人中下病根了，“文革”中打人、杀人只不过是慢性病的急性发作。

下面的照片，是当年清华大学红卫兵批斗“反动学术权威”——不同学科的学术精英——的现场实拍。批斗会场上，我们姑且称为“蒯大富”们的“文革”在校大学生们个个义愤填膺，振臂高呼“打倒”的口号。其中五名大学生将脚踏在五位匍匐跪倒在地地的“学术权威”——不久前还给他们上课，热心向他们“传道、授业、解惑”的优秀师长们——的背上。这张照片，是对毛泽东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图象注解！什么叫“斯文扫地”？这就是！中华民族应当鼓足勇气，将这张照片和毛泽东的画像、共产党“大名”放到一起，大张旗鼓地贴到中华文明的耻辱柱上，让后世子孙永志不忘！（见本刊“文革图片资料馆”——“造反有理”第四页第一图——编注）

大量事实使我们看到，“蒯大富们”，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

年龄在 25—17 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由于长年累月被强灌“狼奶”，毒素不断积累，确实导致他们的性格变态。这种变态并非只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性变态”。

那么，再让我们看一看，同样是由于长年累月被强灌“狼奶”，这个“狼孩群体”缺少的又是什么呢？

## 一、缺独立思考精神：

束缚“小脚女人”双脚的是裹脚布；束缚“蒯大富们”，即“文革”期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的“思想裹脚布”是“听党的话”。从“蒯大富们”一懂事起，就像旧时代像小女孩儿四、五岁就开始裹脚一样，被一层又一层紧紧地裹上“听党的话”的裹脚布。更可悲的是，旧时代裹脚只裹女孩儿，如今则是不分男女——“通通地裹”！

这些学生，从小到大，唱的是：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跃进唱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不难设想，成年累月唱这种浅薄、粗陋歌曲的青年人，思想因长期禁锢而变形，其畸形类似于传统的“小脚”，所以这一代人最少自由意志，最缺少独立思考精神。

在“文革”前十七年，进行“独立思考”就是对抗党的领导。譬如那位被称为“鬼才”和“怪杰”的著名戏剧家魏明伦，出生于 1941 年，正在我们探讨的年龄段之内，但他不是“文革”期间的在校大学生。他由于进行“独立思考”，早在 1957 年他刚刚十六岁的小小年纪就在“反右”中遭难，被打入“敌我矛盾”的“另册”，被分配到农村劳动，二十多年中厄运连连，根本没有资格进大学的校门。魏明伦先生深受共产党围剿“独立思考”之害，所以早在二十年前的 1986 年 3 月，就写出题为《我“错”在独立思考》的文章，揭露党当年对“独立思考”的绞杀，他说：

“‘独立思考’这个词儿，近年已无贬义；可在三中全会之前，在十年浩劫之中，在批判《武训传》之后，‘独立思考’似乎是‘脑后生了三根反骨’的近义词，谁沾上谁倒霉！我就因此铸成大错，误了前半生。”

由于共产党围剿“独立思考”，年轻人只剩下一条可走的路，那就是“听党的话”！而所谓“听党的话”，又是如此戕害青年人的心灵才智，使他们的思想被紧紧地裹上了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人人的思想都变成了怪模怪样的“三寸金莲”！

## 二、缺起码的人性：

在“文革”之前十七年中，那些“蒯大富们”，即出生于 1941 年—1949 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 25—17 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被关闭在全盘否定个性的封闭环境中去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得青少年对社会的真相和人生的真相一无所知，远离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道德礼、义、廉、耻，更与人类文明的成果——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绝缘。听多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使他们敢于放开手脚作恶，敢于肆无忌惮地去作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道德律”，更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他们自称“大无畏”，而这种“大无畏”的勇气源于没有任何道德底线。

造反时，他们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这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毛泽东的“教导”如此，这些人便崇尚暴力，缺少起码的人性。他们狂妄地将仁爱、宽容、诚信这些人类的核心道德视为粪土。在“文革”辩论会上，有人大言不惭地宣称：“平等”、“博爱”是只配“到厕所里去讲”的“垃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谭力夫在1966.08.20辩论会上的发言，见本刊zk9901b——编注）

在“仇恨意识”主宰下，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顺理成章了，人人都要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其可怕的后果是，年轻人的头脑一旦被“仇恨意识”占据，就会进行“暴力思维”，与“善良”、“仁爱”、“同情”这些人类美德无缘。那些“蒯大富们”，即那些出生于1941—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其中不少人变得神经兮兮的，整天不是担心自己被别人咬，就是琢磨着自己怎么去咬别人……

人类善良的禀赋本是来自幼年的教养。虽然在“蒯大富”们身上反映出这么多的问题，但“蒯大富们”是不幸的受害者。以写教育题材闻名的散文作家吴非先生就曾经满怀义愤地质问：“为什么没想到同情与爱才是应当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呢？……正是‘十七年’教育路线的错误，导致文革开始阶段的残酷与疯狂！”（吴非：《善良的心是一盏灯》）

### 三、缺完整知识结构：

为了牢固确立“一个领袖一个党”的独裁地位，即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对社会科学进行了比封建宫廷阉割太监更加彻底的阉割手术——太监只割除一个器官，党割除了社会科学整体中的一系列器官——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神学等学科……，使好端端的社会科学整体变成了“特等残废”。即使侥幸予以保留的学科，学科本身也遭到七零八碎的阉割，同样成为残废。当时，共产党的全面封杀实在厉害，历史系的学生见不到一篇胡适的文章，中文系的当代文学史只字不提张爱玲。

“狼孩”们虽然都是大学生或准大学生，有些人成绩优秀，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孤陋寡闻，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的缺陷。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害得他们除了阶级斗争之外什么也不知道；更可怕的是，他们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文革”中因坚持“血统论”而名声大噪的北京工业大学24岁的在校大学生谭力夫在辩论大会的讲台上就曾经豪迈地说：“有人跟我讲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不懂那一套，我只知道毛泽东！”谭力夫说到这里，居然博得台下听众的“热烈鼓掌”。这个场面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它将那些“文革”期间在校的大学生们“狼孩”特征之一——知识结构残缺不全——暴露无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谭力夫在1966.08.20辩论会上的发言，分别见本刊zk9603a和zk9901b——编注）

需要说明的是，“狼奶”诚然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体，但是，把一切愚民教育的账都算在毛泽东的头上也是有失公平的。对青年实行“愚民教育”的，是中共领导群体的“群体性”行为，在将青年人“工具化”的过程中，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几乎人人都出过力：

毛泽东号召青年“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什么？学习“甘当螺丝钉的精神”！螺丝钉，一颗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思想的钉子，全凭拧螺丝钉的那只手摆布，拧到哪里，就在哪里乖乖地呆着一动不动！

刘少奇号召青年做“驯服工具”。什么是“工具”？镰刀、斧头之类皆是，所有的“工具”都不具备独立的人格，不具备独立的思想。既当工具而又“驯服”，那就是“得力”——只要需要，砍就要砍断，砸就要砸烂，毫不含糊。文革中刷的到处都是的大标语“砸烂某某的狗头”——包括“砸烂刘少奇的狗头”——就是这种工具化人格的例证。

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林彪提出：“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磨盘是什么？磨盘同样是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思想两块顽石，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地围着轴心转，碾压、研磨，不管是什么，只要进了磨道，务必将其粉身碎骨，碾磨成齏粉……

螺丝钉、工具、磨盘，这就是党为当年的青年树立的楷模！再经过党的各级领导人层层宣讲，反复论证，谁还敢对“工具论”说个“不”字？大家都老老实实在当“工具”去！青年人被严禁“独立思考”，这是因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脑壳思考就足够啦！

“文革”前的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如此，于是，我们姑且称之为“蒯大富”们的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的复杂而分裂性格形成了：

既愚蠢而又狡黠；既胆怯而又残暴；既愚忠而又精于自保……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可怜虫，小小的年纪就被“狼奶”无情地“异化”；更加可悲的是，被“异化”的不是个别人，而是人数巨大的群体。从这种意义说，中共的“狼奶”所导致的“狼孩化”，是数以千万计的“蒯大富们”不可抗拒的宿命。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文革”开始时，这些被完完整整强灌了十七年“狼奶”的“蒯大富们”皆已长大成人，被毛泽东当作向刘少奇夺权的“奇兵”，抛到“文革”的火海中，为他火中取栗，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岂止一个蒯大富——都被烧得焦头烂额，有的人甚至白白地搭上了青春的性命！

应当特别警惕的是，至今“狼孩群体”的集体性格还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基本面貌，因为上个世纪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贻害无穷而未被清算。至于“十七年”强灌狼奶，甚至被当作正面的历史来歌颂，误导民众。职是之故，“狼性”未受触动的“狼孩们”依然故我。其中不少人，今天正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领导人”的作用，有的甚至身居要职，在朝中掌握着大权，用他们当年豪迈的语言表达就是——“支撑起共和国的大厦”！

人们看到，在官场里，凡是那些捞钱狠、卖官狠、镇压狠、欺凌弱势群体狠的人物，不少是当年的“狼孩”。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域里，情况也大同小异。“狼孩”的集体性格——对人类来说不可思议、只有狼才具备的本领和特异功能——还在继续在发挥着作用。

在这里，可以举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例子：不久前，即今年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纪委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讲话中点出2006年中被中纪委“痛打”的七大贪污犯的名，他们是：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  
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

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

在这七名大贪污犯中，除了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生于1958年，不在我们探讨的年龄段之内，其余六名，全在我们探讨的年龄段之内，占了85.7个百分点。他们堕落为贪污犯，固然有今天的条件，但十七年强灌“狼奶”罪责难逃。“狼奶”改变了他们身体的基因，使他们缺乏道德操守，没有做人的道德底线。人们全都清楚，这七大贪污犯只不过是遍地皆是的贪污犯中的九牛之一毛，比他们官位高的大有人在，比他们官位低的也大有人在。笔者很希望社会学家就此题目做一番实证调查：看看在今天的贪污犯中，当年被灌“狼奶”十七年的“狼孩”——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究竟占多大的比例。

今天，这个年龄段的人早已为人父母，或为人师表，难免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的不良模式改造他人，或是用体内的“狼奶”基因哺育自己的子女、学生，对后代还将继续起毒化作用，从而对今后的中国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对“狼孩群体”的集体性格不可不做认真分析，为的是肃清“文革”前十七年强灌“狼奶”的流毒，净化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

2007—3—14

~~~~~  
【参考消息】

姚文元新撰《回顾与反思》

• 佚名 •

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去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

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其中爆出了若干历史真相，实际上这是他回忆录的简本。

以下是该《回顾与反思》的部分内容。

◇ 毛泽东对林彪外逃事件的反应

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还不全信，他叫总理（周恩来）再了解进一步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四个多小时，警卫部队找不到林彪后，总理作第三次报告时，毛泽东还半信半疑，对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著天花板长叹一口气，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毛泽东还指著周恩来、江青责骂道：“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

姚文元写道：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摔东西，骂人，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唯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讷由张玉凤陪著，去安慰父亲（毛泽东），才能使毛泽东的情绪平静些。

◇ 毛泽东对周恩来追悼会的意见

姚文元写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要开追悼会。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毛泽东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江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的意见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表态的意见，批上“好”字。在决定谁主持追悼会时，又争持不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

◇ 毛泽东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反应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姚文元证实，对七六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 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 关于总理人选

姚文元写道：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总理人选时，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东兴提名，报送主席的。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张、江青，同时打“□”。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也得等我死后。”

◇ 关于对黄、吴、邱、李的处理

姚文元还爆出史实内幕：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如何处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四人及其他随从的问题，都无主意，请示主席。毛泽东说：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变集团、投向北面敌人的一伙，还处理、解决不了？军事法庭被砸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毛又指示：判黄、吴、邱、李死刑，也不过份。毛泽东还问了多名老师，老师对林彪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四十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人“罪不致死”，要求“养起来”，甚至也有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

◇ 毛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子虚乌有

姚文元还爆出：“九一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姚文元爆出：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构出来的。

◇ 毛为身后事忧虑

姚文元爆出：毛自从林彪事件后至临终，常忧虑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

姚文元又写道：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